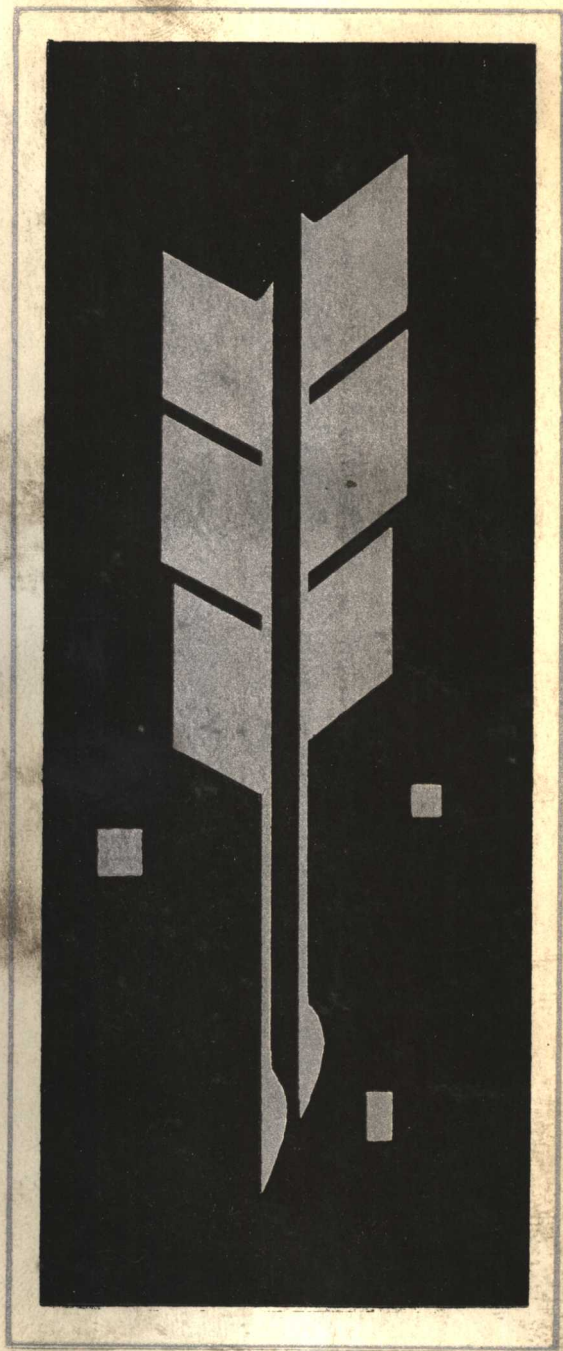


余上沅戏剧论文集



余上沅戏剧论文集

余上沅 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黄冈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7 插图 440,000字

1986年11月第 1 版 1986年11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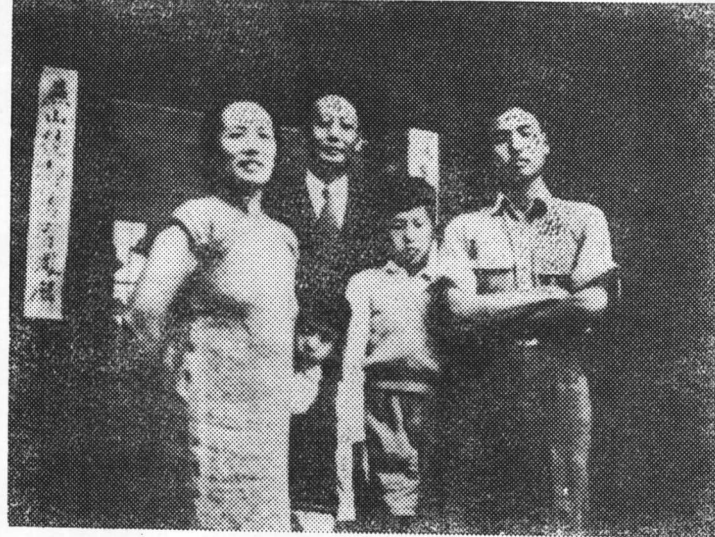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0107·412 定价：4.10元



余 上 沅



摄于一九六五年



余上沅夫妇与二、
三、四子（棣北、
安东、同希）一九
四七年于南京



余上沅、吴祖光
一九三七年从长沙乘
木船入川



余上沅、陈衡粹一九
六五年于上海



著译的一部分

序 一

吴祖光

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者之一，戏剧教育家、理论家、剧作家、翻译家、导演余上沅教授于一九七〇年含冤去世。在他死后十四年的今天，他的遗作《余上沅戏剧论文集》将由家乡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使我深为振奋，也深觉感伤。

一九三七年我的第一部习作剧本《凤凰城》在长沙完稿，于次年在重庆上演，不久又在重庆生活书店出版，我的这个第一本书的第一篇序文就是上沅先生写的。正是先生一手携带我走入戏剧事业的大门，而过了四十七后的现在却由我来为尊敬的先师、前辈、长亲撰写序文，真教我怅触万端。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时迁岁改，往事大都忘怀，但是初次见到余上沅先生的情景却至今如在眼前。一九二六年我才九岁，只是一个初级小学生，记忆中还很年轻的父亲和母亲带我去北京西城当时很时髦的花园饭店去参加表姑陈衡粹的婚礼。表姑是湖南衡山著名学者、诗人陈季略先生的四小姐，曾是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她的二姐陈衡哲已是驰名中外的教授和小说家。女大学生的衡粹四表姑虽然比我要大十多岁，但对我却有特殊的感情，这也是多子女的父母亲只带我一个男孩子去参加他们的表妹婚礼的原因。那一天花园饭店贺客盈门，衣香鬓影十分热闹。我至今记得在婚礼结束之后，翩翩年少的新郎身穿燕尾大礼

服，胸前配带红花，和盛装的新娘一起从重重包围的宾客之中脱身出来，匆匆走过我们面前时，一向稳重腼腆的母亲却闪身挡住新郎的去路，特别把我介绍给他；使我感到失望的是他只是拍了拍我的头，看了我一眼就又被别人簇拥而去了。现在我当然可以理解，在他一生最大的喜庆日子里，怎么能够注意这个只不过八九岁的小小顽童呢？

岁月流逝，我从小学生成长为中学生的时候，发现自己终于受到了四姑父的注意和重视了。那时已经进入三十年代，上沅先生和他的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赵元任、丁西林，熊佛西等创办了一个业余的话剧演出团体“北平小剧院”，不定期地演出话剧。几乎在每有演出的时候我都会得到姑父送给我的戏票，而我也总是兴高采烈地、认真地去观看每一场的演出。演出场所大都在王府井大街帅府园南边的协和医院礼堂，这个礼堂只有二三百个座位，建筑考究，又有良好的音响设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剧院。我现在还能记得的在这里看过的剧目有：《压迫》、《秦公使的身价》、《最后五分钟》、《一只马蜂》等。《秦公使的身价》是王家齐和王鸛芬合演的，王鸛芬是孔德学校比我高几班的女同学；《最后五分钟》的女演员是白杨，那是我第一次看白杨的戏。我穿着母亲为我新做的蓝色丝织品的丝棉新长袍，规规矩矩冒充象个大人那样坐在第一排当中的位子上。

从七八岁开始我就是个京剧迷。但是这种既不唱、又不舞、也没有一点打斗的话剧竟同样对我产生了具有强大吸引的魅力。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在南京担任近代中国第一个话剧专业学府的国立戏剧学校校长的余上沅先生竟很认真地写了一封信给我的父亲，提出要邀我到南京剧校去担任他的校长秘书。那时我还只读到大学二年级，前半学期我为了调剂一下长达十多年的读书生活，受聘在很大规模的国营湖北金水流域农场工作，我的计划

是一年之后仍将回到北平去继续中法大学的学业。收到父亲转来的南京来信之后，“见异思迁”，我毫未考虑便跑到南京去接受这个新工作了。当然，这是“戏剧”吸引了我。记得我头一天去南京国立剧校报到，当晚便去剧场看剧校第一届学生的毕业公演，剧目是莎士比亚的名作《威尼斯商人》，导演是余上沅校长自己，演员叶仲寅（叶子）、陈健、蔡松龄、洗群、凌风（凌子风）等。他们几十年来都是剧影坛上的中坚人物，有人至今还在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在国立剧校工作了四年，也就是和上沅先生在一起工作的四年，尤其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剧校内迁长沙约近半年之中、连生活都在一起的时间里，上沅先生热爱戏剧事业，为事业献身的精神，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他的心思几乎一刻也离不开这个风雨飘摇、苦难重重的学校。离开了南京，教职员的力量大大减弱，建立新校址、安排生活、补充教员，在在都是难于解决的问题。从一九三七年夏天到一九三九年的两年里，剧校从南京迁到长沙，再迁到重庆，最后迁到长江上游的小城江安才安定下来，都需要他亲自去一个个解决困难。据我现在的回忆，上述的一些困难还是易于克服的，最严重的却是反动统治和进步思想的斗争。尽管当时是所谓全民抗战的时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二度合作，但是国民党对青年学生的思想管制一刻也没有放松，因此上沅先生在长沙的那段时间里，曾经特意地去邀请著名的共产党员徐特立同志来到稻谷仓的临时校址做时事报告，就成了一次震撼人心的事件，表现出他的政治态度。

然而不久之后，国民党当局就加强了思想管制，采取的措施是任命了新的所谓“训导主任”。新主任经常满面笑容，但是却内藏奸诈。我曾经碰到几次他在对校长施加压力，并且指出学生的名字，只是由于我走近了他们便住口不说了。办学校要为这种事情操心，校长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在貌似平静、听不见敌机喧

籍的江安小城里，剧校内部隐伏杀机，因此烦恼的校长便常常和当地的绅士们打牌吃喝，这自然难免引起青年学生们的不满和议论……但是余先生只是一个书生，他该怎么办呢？

什么时候艺术能摆脱反动势力的纠缠？对于专业满腔激情、无限热爱的人却常常要受到没完没了的无谓的政治干扰，这真叫人灰心丧气；而文学艺术偏偏又和政治不能分开，因此这种苦恼就永远难以摆脱。

两种思想、两种力量斗争激烈的四十年代，国民党已经置抗战于不顾，而把全部力量放在扼杀共产党所代表的进步力量方面；剧校校长当然顶不住这股压力，吃喝打牌更暴露了知识分子的软弱。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剧校的几个富有才华、业务优秀的学生被国民党公然逮捕了。就在这样的时刻我离开了决定我一生命运和方向的剧校。

四年的相处，使我熟知了我的老师、姑父，又从师母、又是姑母的悼念文章里，使我知道上沅先生五岁的时候就有为了看戏逃脱大人的监视，一夜不归弄得全家失魂落魄的惊人事迹；成年后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到西方求学时，又宁肯放弃难得的经济支不学政治改学戏剧，终至由于经济的支绌被迫提前结束学业而归国。他生来就热爱戏剧，并且在留学深造离开祖国时公开发表“我爱文学而尤其爱戏剧”的宣言，他的一生也证明他实践了自己的宣言。但是他没有走戏剧艺术家的道路，而走的是戏剧教育家的道路；他决不缺少做为一个戏剧艺术家的素质和才能，但是他看得更高更深更远，他着眼于更宽广的戏剧事业。只有富于牺牲精神的人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因为在那一段艰难时世里，他这个戏剧学校的校长并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在戏剧的专业上，而要用更多的力量应付那些险恶而又庸俗的政治纠缠。

即使如此，余上沅先生还是在他的一生里留下了为数可观的戏剧著作，这里面有创作的剧本，有大量的戏剧理论，占更多数

量的是西方戏剧大师的理论和研究。现代的话剧本是源自西方的产物，上沅先生是最早把西方戏剧介绍并移植到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建立和壮大有不容抹煞的功绩。二十年代他和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提倡“国剧运动”，在当时是起了很大影响的。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一本《国剧运动》论文集，余上沅在序言中说：“中国人对于戏剧，根本上就要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这样的戏剧，我们名之曰‘国剧’。”这是将近六十年前老一辈戏剧家为新兴的话剧下的注解，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话剧民族化，中国的话剧。

对于我们国家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戏曲，上沅先生也是研究有素，并且对之充满热爱和深刻理解的。他在《旧剧评价》一文中，对西方戏剧和中国戏剧分别作了“一个重写实，一个重写意”的精到而且细致的分析，并把重写意的中国戏剧理解为“最纯粹的艺术”。他说：

只要写意派的戏剧在内容上，能够用诗歌从想象方面达到我们理性的深邃处，而这个作品在外形上又是纯粹的艺术，我们应该承认这个戏剧是最高戏剧，有最高的价值。

在《中国戏剧的途径》一文中，他对象征的中国戏剧和写实的西方戏剧热情地寄予“不期而遇”，“联合势力”的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期望。他说：

并不是希望大家站在平行线上走。绝对的象征和绝对的写实是得不到共同之点的。好在平行线是理想的，把所谓之平行线引伸到极长极长的时候，其终点还是两相会合。写实与象征也是一样，彼此多少有点互倾的趋向，这个趋向是叫它们不期而遇的动机。等到时机成熟了，宇宙、人生、艺术、戏剧、一切的一切，都得了最终的调合，那么古往今来的那个大梦也就实现了。

一九四一年七月底，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我做为去看望在重庆服官的父亲而离开了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临行前我去和校长、

姑父和姑母辞行，那时国民党特务已经在学校里下手捕人，学校里危机四伏，魔影憧憧。在这前两天我去过江安县政府监狱，去探视过刚刚被捕的第四届学生许绶曾——即著名戏剧评论家梅朵。所以去和姑父母告别时心情沉重，没有什么话好说；不能保护他自己的学生，我知道那不是他校长的过错。临时时我没有讲下学期开学时我是否再来，但我已经决定不再回来了。从学校离开南京以后，我已经被姑父指定为担任几种功课的教师了，虽然有的学生年纪比我还要大些。我相信余校长也已预料到我将不再回校，我从他脸色阴沉但强做微笑的表情上看得出来。从那天以后我便和他几乎断了音讯；记得只在全国解放后的五十年代才有很少几次短暂见面的机会。

全国解放前夕，余先生避开了国民党去台湾的胁迫，到上海闲居盼来解放，先后在沪江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然后由于周总理面嘱“归队”而极力争取调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我想这本应是他最为理想的安心教学的黄金时代，但是却仍旧未能逃脱政治迫害的纠缠，始而受“杨帆冤案”的无辜株连——一九三五年余先生创办国立戏剧学校时，曾延聘他的学生、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石蕴华同志在剧校担任教职。石蕴华是杨帆的化名；继而受“文革”的摧残凌辱，竟于一九七〇年因患癌症不得治疗，乃致体力枯竭而死，死前还在从事翻译任务，应该说他至死也没有离开戏剧工作岗位。在去世当天的下午，他对远道赶来探病的儿子说：“我没问题！事情快解决了！”显然，事情并没有解决，他是含冤而死，死不瞑目的。

余上沅先生从事戏剧事业约半世纪，但命运坎坷，艰苦备尝。现在他的著作行将陆续问世，是对他应有的报偿；还有值得称道的是他辛勤办校十四年，长时期把当代戏剧界的最有才华的一些戏剧大家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从而培养出来大批戏剧和电影方面的专业人才，门墙桃李遍及海内外，其中不乏英颖独特的名

家学者，足可告慰先生于地下。

正是由于上沅先生大半生的不幸遭遇，在近代文学史和戏剧史上，他受到了显然的冷遇，虽然在一九八一年五月由上海市公安局对他做出全面平反、恢复名誉的结论，但是一些重要辞书和史料上都抹掉了他的名字，未能给予他应有的地位和荣誉。当此举国大治，拨乱反正，危害国家已久的极左思潮面临全面溃败的时候，我希望这篇小小序文能引起曾经得到过余上沅先生的友谊和教导的海内外故交戚友以及门墙弟子对已经辞世十四年之久的戏剧大师的温暖追怀和悼念。

1984.9.19于北京

序 二

贾植芳

我和余上沅先生的相识和相交，算来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一九五二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我们分别由别的院校调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因为都教现代文学，又住在一个宿舍里，彼此为邻，所以由相识而渐渐熟稔起来了。余先生比我大了近二十岁。早在三十年代初期，我因为喜爱文学，杂读各类书刊，所以也早就知道了余先生的大名，算是一个老读者了。众所周知，他在二、三十年代，是新月派文学社团成员，属于学院派的人文学士，和我这样奔走在时代风沙中的文艺学徒，是两种范畴的存在。但我也清楚地知道，他是我国最早一代的戏剧教育家之一，毕生从事戏剧事业，早在一九二五年，他从美国学成回国后，就和他的同学闻一多、熊佛西等人，首先把被封建士大夫所不齿的“小道”：戏剧，在当时的高等学府——北平国立艺术学院，正式成立了专业 为中国的新剧运动，无论是理论建设，话剧的创作和翻译，舞台艺术的研究等方面，培育了各类专业人才，打开了一条新的事业通路；后来他又当了十四年的国立剧专校长，以迄解放前夕，继续为中国现代戏剧运动培育人才，扩展专业干部力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作为一个戏剧家和戏剧教育家，我对他是敬重的；尤其是后来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熟惯了，我从余师母、陈衡粹大姐的言谈中，知道他在解放前夕，正在英

国和捷克考察和开会，他心向人民，谢绝了英国的聘请，毅然飞回祖国迎接解放，不愿留在异国去过优裕的生活，象他的新月社同人胡适、陈西滢、凌叔华夫妇、顾一樵、梁实秋等人那样。他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气节。作为一个爱国学者，更使我对他肃然起敬，为他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的明智选择而高兴。

那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正式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现代文学教学课程，由余先生、方令儒先生和我上课，余先生教戏剧，方先生教诗歌，我教小说，我算是教研室负责人。听学生们说，余先生教学认真负责、讲课有章有节、层次线索分明，从不在课堂开无轨电车，因此教室空气很严肃。我那时年轻，习惯在晚上工作，每当夜深人静时分，我走下楼来吃宵夜，总看到对面余先生楼下书室里的灯亮着，他还在备课。他努力使自己 and 时代同步，跟上新生活节奏和规律。从这闪亮的灯光中，我看见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那颗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诚的心，他的闪亮的心。

那个时代，人们有一种解放的喜悦感，一股狂热劲头，仿佛长期困于饥饿的人，忽然得到了美味的食物，不顾一切的大嚼大咽一样，人们身上有使不完的劲，总想多干点什么才过瘾。正如余先生一九五四年在《大公报》上写的《谈谈万尼亚舅舅》一文中，他在谈到剧中人物苏尼亚时所说的那样：“她又重新工作起来，并且劝她的舅舅也工作起来，一同为走向美好的生活而奋斗。她告诉万尼亚舅舅说：‘我们得生活下去，我们要活下去，……我们就会看见一个光明的、可爱的、美丽的生活啊……。’”这段话正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心境的写照。余先生来复旦后，除了繁重的教学任务，继续搞起文学翻译，他为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翻译了苏联短篇集《队旗》，为泥土社翻译了美国进步作家小说集《光明列车》。从这两本译文题名的选择上，也反映了余先生对党的信任和感激之情，他赞美和向往新生活，为新生活唱赞歌，对生活的光明幸福前景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复旦各系学生那时候组织起话剧团，余先生是当然的顾问和指导。就我的记忆，在我们共同相处的短短三年内，他指导学生排演过鲁迅的《阿Q正传》、郭沫若的《屈原》和契诃夫的《求婚》等剧。那次排演《阿Q正传》时，我们夫妇和刘大杰先生都应邀到场观看了排练，在习惯地称为登辉堂的大礼堂内，演员们在台上，他和我们这几个客人坐在台下的观众席上，仿佛是一个观众；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学生们的一言一动，不时厉声地喊叫着“不对了！”“重来！”等等。更多的是他随时象一阵风似的跑到台上，对演员们言教身教。看到他这种生龙活虎、一丝不苟的排戏精神，我忽然想起契诃夫的话：“舞台就是圣殿啊！”我从这里体味到他那种热爱事业和忠诚于事业的情怀。

大约是一九五三年的冬季，深更半夜里突然有人急促地敲我家的门，我正在楼上工作，家里人早已入睡，我忙下楼去开门，原来敲门的是余师母，她面色苍白，神情慌乱地对我说：“老余昏过去了，你看……”我从她的神态上看出事情的严重性，我一边喊我的妻子任敏赶快起来，一边大步流星地跟她走上她家楼上的卧房，余先生这时平躺在床上，还穿着厚厚的棉袍，脸色灰暗，双目紧闭。余师母喊着说：“上沅，你醒醒，贾先生他们来看你了……”任敏也披着衣服赶到了，我俯身摇着他：“余先生，余先生！”余师母在地上急得团团转，仿佛我是个医生什么的，因为在这深更半夜，宿舍内已一片漆黑，人们早已入了梦乡了。余师母说，他今晚照例在楼下书房工作到现在，在她睡了一觉醒来，下楼催他去睡时，就看到他的神情有些不对，到扶他上楼梯时，一个跟头翻倒了。她已给他灌了些什么救急药物。这时他微微睁开了眼，一看到我们夫妇，责备余师母说：“怎么深更半夜地把老贾他们吵来了！”我看到他醒过来了，连忙劝他说：“我们还没睡，余先生你千万不要连续地开夜车了，你比我大了近二十岁，时间长了不是事啊！”我一面说着，不觉眼里溢出了泪水。

第二天上午我起床后，首先赶到他家，迎头碰到余师母，她说，他今天有课，一早就上课去了。

到了一九五五年初夏，一场政治风暴自天而降，我们夫妇双双被卷进反胡风运动，先后进入牢房，接受审查。我的四岁的小侄女和她的在上海聋哑学校上学的十四岁的哥哥，我的侄儿，也被打发离开了上海，他们逃难似的回到了北京的父母身边，我们这个家就算“打烊”了，从此我们和余家失去了联系。

大约在一九五九年，我在监房看《解放日报》，那上面报道说，复旦外文系同学用英语排演曹禺的《雷雨》，上海戏剧学院余上沅教授三次来校指导排练，说他不顾年老体弱，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挤上公共汽车来校热心指导学生，每次排完后又匆匆地挤上公共汽车赶回学院，婉言谢绝一切招待和报酬，云云。……我读到这则报道后，心里先是抖动了一下：他怎么不在复旦了？但看到故人无恙，而且报纸上还对他表扬了一番，又着实安心，因为在这段时间的当中，即一九五七年，又有过一次热火朝天的反右运动，我也是从报纸上得知，我在复旦的同事们，一些老教授，文理科的都有，都纷纷“落网”，正如上海俗语说的：“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转瞬之间，都成了“人民的敌人”，走到他们生命的末途上了。

历史七歪八扭地走到一九八〇年，党和人民粉碎了真正的暗藏反革命林彪、江青一伙，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祖国大地日月重光，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以其真实的健康的本色回到我们生活中来了，随着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复苏，极左思潮和路线所制造的一切冤假错案，在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指引下，得到了甄别与平反，我这时才“由鬼变成人”，恢复了“人籍”，我又回到人间的正常生活里来了，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消逝或变得模糊的一些人与事，纷至沓来，充满了我的生活空间。我又有机会碰到八十高龄的余师母衡粹大姐，我这才知道了在我们一九五五年